

# 同盟瓦解：鄧小平時代的中朝關係，1977-1992（下）

• 沈志華

編者按：本文第一至三節已於2018年4月號刊出；本期刊出第四至五節。

## 四 經貿政策變化：同盟經濟基礎的崩塌

一直以來，朝鮮的經濟發展主要依賴於蘇聯、中國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援助，因為朝鮮是社會主義陣營的「東方前哨」，大家對此無話可說。但是隨着國際局勢的變化，這種「必要性」愈來愈失去意義。1970年代初期中美關係緩和，1980年代中期中蘇關係走向正常化，中國以經濟援助「拉攏」和「取悅」朝鮮的根基已經動搖。另一方面，作為同盟的經濟基礎，中朝經濟關係是一個「單向閥門」，對於中國來說，這就意味着朝鮮無窮無盡地要求援助和沒完沒了的拖賬欠債。過去中國實行計劃經濟，國家大包大攬，又提倡「國際主義」，對此可以接受和容忍。但是隨着國內經濟體制的逐步改革，市場經濟因素的不斷加強，「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已經很難再成為維繫中朝經濟關係的準則。在這種情況下，特別是在來自朝鮮半島另一方的經濟因素的強烈刺激下，中國對朝鮮半島的經貿政策陸續發生改變，北弱南強，最終導致中朝同盟經濟基礎的崩塌。

還在毛澤東時代晚期，朝鮮就已經負債纍纍。據西方報紙報導，截至1976年3月，朝鮮對共產黨國家欠債7億美元，對非共產黨國家欠債5億美元，基本沒有能力償還。西方各債權國紛紛派代表團前往平壤談判，敦促其還債，但朝鮮政府一概不予答覆<sup>①</sup>。當時剛剛復出工作的鄧小平便遇到一個難題：朝鮮提出的軍事援助要求大大超出了中國的能力，總參謀部請示定

\* 本文收入沈志華《最後的「天朝」：毛澤東、金日成與中朝關係（增訂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8）一書，經作者和出版社同意授權轉載。

奪，鄧小平的意見是「不宜再增加」<sup>②</sup>。毛澤東後來是否批准不得而知，但鄧小平的務實外交思路自那時起便可見一斑。

打倒「四人幫」以後，國務院主管經濟的領導幹部對朝鮮的態度就開始有些變化了。1976年中朝計劃貿易金額為9.75億瑞士法郎，而朝鮮只完成了52%（中國完成86%），於是1977年的計劃金額便調降至8.2億。但朝鮮仍未完成出口任務，中方為了避免損失，也只好相應調整出口額。不僅如此，在1977年3月雙方貿易談判中，中國還拒絕了朝鮮繼續貸款的要求，而只是允許將債務償付延期至1980年<sup>③</sup>。同月，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還批准了財政部關於改變同朝鮮等社會主義國家非貿易支付清算辦法的報告，批語說：「有條原則，我們不能吃虧。」<sup>④</sup>從這時起，中國對朝鮮的經濟和軍事援助便有所減少<sup>⑤</sup>。

1979年2月中越戰爭爆發，中國需要北部邊境地區穩定，有求於朝鮮。4月金日成秘密訪華，隨後中國恢復了對朝鮮的無償軍事援助，還答應以半價向朝鮮提供石油，建立輸油管道等<sup>⑥</sup>。根據《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和《朝日新聞》的報導，1982年8月中國向朝鮮提供的經濟援助價值達1億美元，還提供了四十架當時中國最先進的經改裝的米格-21飛機，而此前中國給朝鮮的只是比較落後的安-2飛機和T62坦克。1980年以來，中國每年還向朝鮮提供七十萬桶石油<sup>⑦</sup>。1983年9月，金日成秘密訪華，再次提出軍事援助要求，並希望在中國境內由中方幫助培訓一個師的米格-21飛行員。鄧小平滿口答應。1984年，中國又向朝鮮提供4億美元的貸款。1985年，中國還答應從1986年起連續五年每年向朝鮮提供1.5億元人民幣的經濟、軍事援助<sup>⑧</sup>。

1984至1985年蘇聯對朝政策轉變，朝鮮立即向蘇聯靠攏，而此後中蘇關係漸漸步入正常化過程。由於朝鮮在中國外交和地緣政治方面的價值下降，1985年底鄧小平開始調整對朝鮮的經濟政策。12月13日鄧小平邀集胡耀邦、楊尚昆等人討論對朝政策，鄧說：要總結同朝鮮打交道的經驗，不能使朝鮮有錯誤的理解，要甚麼我們就給甚麼。針對朝鮮提出的新要求——培訓期滿的朝鮮飛行員繼續留在中國五年，然後架機返回，鄧小平斷然拒絕，並說：朝鮮人當然不高興，那就讓他們不高興。要防止他們把我們拖下水。我們花了很大力量來援助越南、阿爾巴尼亞和朝鮮，現在同越南和阿爾巴尼亞都鬧翻了，準備第三個也鬧翻，但爭取不翻<sup>⑨</sup>。毛澤東時代，中國對朝鮮援助和經濟政策的原則是「只算政治賬，不算經濟賬」，如今改革開放，搞的就是市場經濟，怎能不算經濟賬？

此時，又有一個新的因素——南朝鮮（今稱韓國）「經濟奇跡」出現在中國面前，進一步堵住了中朝經濟關係回頭的後路。早在1979年春天，中國一些內部刊物就開始發表關於韓國經濟貿易迅速發展的文章和資料<sup>⑩</sup>。儘管1981年3月中國外貿部矢口否認中韓之間存在貿易，但有資料透露，中韓之間零星的間接貿易在1976年就已經出現了<sup>⑪</sup>。有關中韓貿易額的具體數字，最早的資料是1979年的1,900萬美元，第二年就猛增到1.88億美元，增長了將近九倍，不過那一年中朝貿易額還是6.77億美元。到1984年，中國與朝鮮和韓國的貿易額已相差無幾（4.98億和4.43億美元），而1985年情況突變。是年9月，在討論韓國一再提出開展直接貿易的要求時，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雖然仍

堅持了以往的方針，但也認為在間接貿易上，可以採取更加積極的態度<sup>⑫</sup>。這一年中朝貿易額下降至4.88億美元，中韓貿易額則幾乎翻了兩番，達到11.61億美元<sup>⑬</sup>。與此相關的情況是，到1987年，朝鮮對中國的債務已達13億美元<sup>⑭</sup>。可以肯定，這種狀況也是中國考慮調整對朝鮮半島經濟政策的重要因素之一。

從1985年底開始，在中國改革開放初期頗具影響的上海《世界經濟導報》連續刊登有關韓國經濟高速發展的文章，很是引人矚目<sup>⑮</sup>。1988年2月國務院召開全國省長會議，副總理田紀雲將「自負盈虧」定為外貿體制改革的首要目標<sup>⑯</sup>。總理李鵬在7月2日接受日本新聞機構負責人採訪時公開承認，中韓之間存在民間貿易關係<sup>⑰</sup>。7月和11月，《世界經濟導報》連續刊文，呼籲對南朝鮮開展直接貿易，認為這符合雙方利益<sup>⑱</sup>。如此，中韓貿易額更加快增長，而中朝經濟關係更難以為繼了。1988年5月朝鮮提出5億美元的巨額軍事援助要求，被中國婉言拒絕。1989年政治風波後，金日成派人送信給鄧小平，表示支持平定「暴亂」，同時要求經濟援助。中國同意在1991至1995年繼續向朝鮮提供每年1.5億元人民幣的經濟、軍事援助，但做了一些調整：把以前按照半價提供石油改為按照國際市場價格提供，並分別在貿易項目下或以貸款方式提供。另外還決定，從1992年1月開始，將過去的易貨貿易轉變為用外匯結算的直接貿易，而且希望兩國企業間的往來盡量減少政府的干預與限制<sup>⑲</sup>。

儘管受到平壤的抗議和干擾，中韓經濟關係還是曲折地向前發展<sup>⑳</sup>。到1990年代初，中國與朝鮮南北雙方的經濟關係已經發生了結構性的根本變化。1990年中韓貿易總額達38.21億美元，而中朝貿易額卻下降到4.83億美元。到1992年中韓貿易額又猛增到63.75億美元，中朝貿易額卻只有6.96億美元<sup>㉑</sup>。1990年朝鮮貿易赤字高達6億美元，拖欠外債已達78.6億美元<sup>㉒</sup>。1994年朝鮮的國內生產總值(GDP)為212億美元，而1995年的欠債就有122.2億美元，其中欠俄羅斯43.2億美元，欠中國29億美元<sup>㉓</sup>。在這種情況下，朝鮮經濟只是中國的負擔，而韓國經濟則成為中國的助力。

中國批准簽訂的外商在華直接投資項目協議，朝鮮從1986至1994年九年間共有186個，總計金額1.02億美元，實際執行0.269億美元；韓國從1992至1994年三年間就有4,227個，總計金額37.8億美元，實際執行12.16億美元。按照1979至1994年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和勞務合作項目的金額計算，在朝鮮的營業額僅為942萬美元，這在中國周邊的亞洲國家中，比排在最末一名的印度只多100萬美元。到1994年末，中國從事對外承包工程和勞務合作的人員，在韓國有16,982人，在朝鮮只有25人<sup>㉔</sup>。這些數字充分說明，中朝經濟關係已經微不足道，而中韓經濟關係的不斷躍進必然要求政治關係的改變。

## 五 中韓建交：地緣政治基礎徹底瓦解

鄧小平的對外方針，儘管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仍然受到中蘇關係對立的制約，但中國對朝鮮半島的政策和與北方不和諧的情況仍然處處可見，而與南

方的利益契合點則愈來愈多。在這段時期，中國對朝鮮問題的處理原則上是採取「置身事外」的方針：千方百計推動朝韓會談、朝美會談，但反覆以不干涉朝鮮內政為名，強調自己不參與會談<sup>⑳</sup>。對此，1979年2月鄧小平訪問日本時解釋說，中國不直接與南朝鮮接觸，「採取超然的不偏不倚的立場更為有利」，「可以敦促北朝鮮進行南北對話」<sup>㉑</sup>。不過，在和談、撤軍、統一等一些影響朝鮮半島局勢的基本問題上，中國的立場和態度還是非常明確的。

自中美關係緩和以來，中國就把穩定朝鮮半島局勢作為最主要的長期目標，對朝鮮的要求只有一項——必須通過談判解決問題。1978年10月，鄧小平訪日時明確對首相福田赳夫說：朝鮮問題處理起來很困難，中國也不太想過多插手，但中國不會支持北朝鮮採取某種行動。1983年11月總書記胡耀邦訪日時對首相中曾根康弘說，中國誠心誠意希望朝鮮半島長期穩定，贊成南北朝鮮以聯邦制形式實現自主和平統一，而不是一方吃掉另一方，並針對同年10月發生的緬甸仰光爆炸事件指出，「不論是哪個國家幹的，中國都不贊成恐怖活動」<sup>㉒</sup>。這一點，美國人也看得很清楚。儘管1982年9月金日成訪華形成中朝整體關係「特別融洽的氣氛」，美國國務卿舒爾茨（George P. Shultz）還是在一封電報中指出，中朝之間存在着一種根本衝突，即「中國尋求維持整個東北亞的穩定而金日成卻渴望在其有生之年統一朝鮮」<sup>㉓</sup>。1991年10月金日成最後一次訪華時，鄧小平勸告他，不要把矛盾吸引到自己身上，要學會打太極拳。不要使（南北）談判破裂，拖下去為好<sup>㉔</sup>。1991年底，金正日派人向中國傳話，在朝鮮人民軍「教訓」南方的時候，請求中國給予必要的支持和援助。江澤民堅持認為，朝鮮方面不應採取任何挑釁行動，拒絕了金的要求。此外，中國還多次拒絕了朝鮮關於進行海上聯合軍事演習以及在軍事研發項目上合作的要求<sup>㉕</sup>。中國需要的是周邊環境穩定，而朝鮮則不斷在東北亞製造緊張局勢，雙方利益訴求的距離已經拉開。

關於美國軍隊撤離朝鮮半島的問題，雖然為了照顧朝鮮的利益和情緒，中國在公開場合還是一直呼籲美國撤軍，但實際上在1970年代初就已經改變了看法，甚至在私下承認，美軍的存在是朝鮮半島穩定的因素之一<sup>㉖</sup>。中國關於要求美軍撤出朝鮮半島的提法，也悄悄發生了變化。1978年10月25日，鄧小平在東京記者招待會上轉述了金日成的說法，暗示美國撤軍是朝鮮和平統一的前提條件<sup>㉗</sup>。1983年7月胡耀邦還對朝鮮最高人民會議代表團說，朝鮮統一的前提是一切外國軍隊全部從南朝鮮撤走。但是到1984年5月，胡耀邦的說法就緩和了許多：在實現朝鮮自主和平統一的過程中，這個問題必須得到解決<sup>㉘</sup>。到1988年7月與舒爾茨會見時，鄧小平更明確地說：中美兩國關係需要發展，要提到維護世界和平和全人類利益的高度；因此，「美國在南朝鮮的軍事存在是可以理解的」<sup>㉙</sup>。

關於朝鮮半島和平統一的程序問題，中國原來一直反對韓國提出的「交叉承認」和南北雙方同時加入聯合國的主張。核心的問題是，中國當時仍繼承傳統的看法，認為「只有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才是朝鮮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sup>㉚</sup>。1980年10月金日成提出首先建立高麗聯邦共和國再加入聯合國的方案後，中國一直表示全力支持，此時中國領導人看重的是，這種「一國兩制」

的方式可以減少朝鮮半島的危險因素，增加國際安全與穩定的有利因素<sup>⑳</sup>。到1987年5月會見金日成時，鄧小平所強調的是：關於統一，關鍵是把經濟搞上去，「要體現出我們的社會制度確實優於他們的社會制度」<sup>㉑</sup>。這其實就是當年赫魯曉夫(Nikita S. Khrushchev)所說的「和平競賽」，靠制度的優勢戰勝資本主義，歸根結底還是要以北方為主體實現統一。

但是到1991年5月，中國突然改變了態度，支持韓國關於南北雙方同時加入聯合國的建議。李鵬為此專門訪問朝鮮，向朝鮮總理延亨默表明了中國的立場。李鵬還否認了日本電視台關於中國在這個問題上支持朝鮮立場的報導。在次日的會談中，金日成被迫表示，朝鮮會與中國的立場協調。6月17至20日，中國外交部長錢其琛再次專程訪朝，最後與朝鮮商定申請加入聯合國的方式等事宜<sup>㉒</sup>。顯然，朝鮮是迫於無奈才不得不同意在實現統一前南北雙方分別加入聯合國的。中國立場的改變，說明北京已經將「兩個朝鮮」的問題與「兩個中國」的問題進行了切割，並放棄了以社會主義的北方為主體實現朝鮮半島統一的主張。更為重要的是，兩個朝鮮同時成為聯合國會員國，為中韓建交創造了有利的政治條件。中國對朝鮮半島政策的轉變表明，從地緣政治的角度看，中國與朝鮮漸行漸遠，而與韓國愈走愈近。

自中美關係解凍的消息傳開後，聰明的韓國人已經敏感地意識到與中國改善關係的機會來了。1971年8月7日，韓國外務部長金溶植宣稱，只要中共和蘇聯承認我們的主權、放棄敵對關係並停止對北韓的援助，與中共和蘇聯的外交問題可以考慮解決；9月15日又公開說道：韓國隨時都在考慮與包括中共和蘇聯在內的所有國家開展貿易的可能性<sup>㉓</sup>。從1972年開始，韓國就制訂了內部方針：在經濟上積極打通與中國的貿易往來，還希望向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廣交會)派出代表；在政治上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存在，凍結與台灣的政務關係，只維持經濟關係。韓國外務部10月的一份報告提出，可以在海上救援、氣象、體育等領域「逐步探索」與中國合作的機會<sup>㉔</sup>。韓國報紙過去提到中國時只稱「中共」，1973年3月第一次使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sup>㉕</sup>。6月13日韓國總統朴正熙發表聲明稱：韓國將向包括蘇聯和中國在內的所有國家實行門戶開放政策，不管其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是否存在差異<sup>㉖</sup>。

然而，受到意識形態的影響，加上要顧及朝鮮的感受和壓力，中國一直沒有對韓國的善意做出明確回應。根據美國總統卡特(James E. Carter)的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觀察，自1973年以來漢城(今稱首爾)一直試圖改善與北京的關係，但對方沒甚麼反應<sup>㉗</sup>。韓國外交官也感到，對於韓國通過各種方式與中國接觸的嘗試，北京都採取了迴避的態度<sup>㉘</sup>。不過韓國外務部注意到，中國官方對韓國的態度也有微妙變化。如1972年7月4日南北朝鮮發表和平統一聯合聲明後，中國報紙連續刊登歡迎南北朝鮮對話的社論和報導，並停止了對韓國的攻擊，對韓國政府的稱呼也從「傀儡集團」改為「南朝鮮政權」<sup>㉙</sup>。又如，1976年《人民日報》發表了九十篇指責南朝鮮的報導，但語氣比以前稍有緩和，且多是引用朝鮮的報導<sup>㉚</sup>。

鄧小平執掌權力的初期，對韓國的態度依然十分冷淡。直到1978年底，韓國方面仍不斷釋放出友善的信號，希望與中國發展關係<sup>㉛</sup>。11月1日，韓國

總統助理金瓊元在香港新聞俱樂部宣稱，有意實現與中共關係正常化<sup>48</sup>。17日，外長朴東鎮又宣布，政府願意同包括未建交的共產黨國家在內的所有國家做生意<sup>49</sup>。但中國的反應非常謹慎。1978年9月7日，韓國主要報紙援引日本媒體關於鄧小平接見日本新聞界訪華代表團談話的報導說：蘇聯試圖擴大對南朝鮮的影響，但中國不想同南朝鮮接觸<sup>50</sup>。1979年1月，鄧小平直接告訴美國總統卡特，中國不能直接與南朝鮮建立聯繫，認為這是「非常敏感的問題」<sup>51</sup>。意識形態的傳統慣性在中國的政策選擇中一直發揮着重要作用，如果不是因為中國安全戰略的迫切需要，毛澤東絕不會改變對美國的立場。鄧小平也一樣，為了改善與韓國這個傳統的敵對國家的關係，他需要等待和創造「水到渠成」的機會。

為此，作為引導朝鮮半島局勢走向緩和的主要措施，中國一直在積極推動朝美接觸和朝韓和談。1979年1月在會見美國參議院代表團時，鄧小平轉達了金日成的要求，希望恢復南北會談和朝美直接對話。在4月23日與金日成的談話中，鄧小平表示，如果朝鮮加強同美國、日本的商業活動和人員交往，對推動南北談判是有益處的<sup>52</sup>。在8月28日與美國副總統蒙代爾(Walter F. Mondale)的會談中，鄧小平又建議，美國應該在不同層級與朝鮮「直接接觸」<sup>53</sup>。9月27日，中國代表團團長韓念龍在聯合國大會發言，支持朝美會談和以和平協定來替代停戰協定，支持南北對話以解決朝鮮統一問題<sup>54</sup>。營造朝美接觸、朝韓和談的氛圍，在客觀上為中韓關係鬆動創造了條件<sup>55</sup>。

中韓兩國關係首先是從民間開始的，雙方交往主要反映在經濟和體育兩個領域。經濟貿易關係，如前所述，自1980年代初已逐步發展起來。不過，那還是少數商人和企業的事情，在社會層面影響不大，而體育交流則是社會大眾普遍關注的領域。

自「乒乓外交」轟動世界以來，體育交流已經成為中國對外交往的重要領域和渠道，這在開啟對韓國外交的過程中也有充分體現。1982年7月，中國外交部擬就〈關於在國際多邊活動中調整對南朝鮮做法的請示〉，建議今後凡是受國際組織委託在華舉辦的國際多邊活動，如南朝鮮是該組織成員，中國可同意其派人來華參加，中方人員也可應邀去南朝鮮參加類似的活動。這個請示很快便得到了中央領導的批准<sup>56</sup>。1983年8月，中國提出申辦1990年第十一屆亞洲運動會，並保證屆時亞洲奧林匹克理事會成員國代表團將順利入境。這一政策調整，邁出了調整對韓關係的重要一步，為中韓之間人員和社會交往打開了大門<sup>57</sup>。11月25日，中國外交部長吳學謙向日本外務大臣安倍晉太郎透露：中國尊重北朝鮮的意見，不可能與南朝鮮建立外交關係，但不會拒絕中韓兩國學者、運動員之間的往來和居民探親<sup>58</sup>。1984年2月，韓國代表團首次到中國昆明參加戴維斯杯網球錦標賽；同年4月，中國代表團赴漢城參加了第八屆亞洲青年籃球錦標賽<sup>59</sup>。

對推動中韓關係起到重大作用的是1986年9至10月在漢城舉辦的第十屆亞運會。1986年5月中方經「香港渠道」通知韓方，中國希望通過亞運會增進雙邊關係，並將參加亞運會看作是1986年改善中韓關係的最大工作目標<sup>60</sup>。8月17日《人民日報》透露，中國將派出由515人組成的代表團參加亞運會。

朝鮮方面對此非常反感，20日《勞動新聞》發表文章稱，不要讓亞運會「成為分裂主義者的政治玩物」<sup>⑥</sup>，中國未予理睬。22至27日，中國奧林匹克委員會秘書長魏紀中率先遣工作團抵達漢城。在會談中，韓方答應將盡力滿足中方提出的各項要求，協助和配合中方工作，並為1990年北京亞運會組委會提供「特別關照」和「我方經驗」<sup>⑦</sup>。漢城亞運會極大地促進了中韓關係，韓國國民對中國代表團「反應甚好」，中方也認為韓國「展現了友好合作的態度」，亞運會的「友好氛圍有助於雙方政治、經濟關係的發展」。中國還通過官方渠道表示，「在籌備1990年亞運會的過程中，希望在各個領域增進與韓國的合作關係」<sup>⑧</sup>。

1983年5月發生的中國民航296號客機被劫持到韓國的突發事件，為中韓兩國政府第一次接觸提供了機會。中國民航局局長沈圖赴韓進行談判，經協商，旅客和機組平安返回，協議的簽字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航局」和「大韓民國」。對於這次事件的處理，韓方考慮周全，盡量滿足中方各方面的要求<sup>⑨</sup>。7月20日，李先念主持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會議，討論了調整對南朝鮮的政策和做好朝鮮的工作等問題<sup>⑩</sup>。8月14日，韓國國立水產振興院事務官李鐘演到中國參加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和糧食及農業組織(FAO)主辦的會議，這是中國政府第一次發給韓國官員入境簽證<sup>⑪</sup>。此後，鄧小平多次談論調整對韓關係或作出指示，強調改善與韓國的關係具有戰略意義，有利於中國的改革開放、牽制日本、孤立台灣以及緩和朝鮮半島局勢；特別是發展經濟關係，「對我有利無害，對南朝鮮也有利」。1984年5月，鄧小平還特意讓胡耀邦訪朝時要向金日成講清楚：中韓關係的改善對朝鮮也是有好處的<sup>⑫</sup>。

1985年3月又發生了北海艦隊魚雷艇燃油耗盡漂流至韓國海域的事件，中國海軍出動軍艦搜尋並與韓國產生了外交糾紛。兩國政府間隨即建立起「香港渠道」，圓滿地處理了此事，中國領導人對韓國的做法非常讚賞。此後對於一些突發事件(如飛行員叛逃等)，都是通過新華社香港分社和韓國駐香港總領事館協商解決的，雙方對這種接觸和處理的結果都感到很滿意<sup>⑬</sup>。1987年7月22日，鄧小平在一份關於中韓關係的材料上做了重要批示，大意是：與南朝鮮實現關係正常化不能再拖了。隨後，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決定成立中韓經濟關係協調小組，由田紀雲任組長<sup>⑭</sup>。至此，中國將中韓關係的發展納入了官方的渠道。

1988年到1989年初是中韓關係「大躍進」的時期，雙方體育、文化、經濟交流以及人員往來的勢頭迅猛增長。儘管一度受到1989年政治風波的影響，但中韓關係發展的大趨勢並沒有改變，反而加快了步伐。

1988年2月盧泰愚當選韓國總統後，明確提出「北方政策」，認為「改善與社會主義國家的關係已成為外交工作的首要目標」，並把改善對華關係作為其政治資本，向國民承諾一定要突破對華僵局，並制訂了「先中後蘇」的「國策」<sup>⑮</sup>。3月，中國決定將與南朝鮮的間接貿易發展為民間直接貿易，先從山東省做起<sup>⑯</sup>。7月，鄧小平在一個報告上批示：現在「發展同南朝鮮經濟、文化關係的時機已經成熟了，步子可以比原來設想的更快一些，更寬一些」，這是「我們一着重要的棋子，要抓緊」<sup>⑰</sup>。8月，中國派代表團出席在漢城召開的國際

筆會 (PEN International) 第五十二次代表大會，成為中韓文化交流和「意識形態面對面」的開端<sup>③</sup>。9月，中國又無視朝鮮的反對和壓力，積極參加在漢城舉辦的第二十四屆奧運會，進一步推動了中韓關係的發展<sup>④</sup>。1987年中韓人員往來只有1,000人，1988年就增長到8,800人，1989年更猛增到19,000人<sup>⑤</sup>。

中韓政治和外交關係建立的起步是貿易代表處（當時又稱代辦處、辦事處）的相互設立。早在1988年9月，韓方就提出希望中國在韓國設立商務或民間貿易代辦處。消息傳到北京後，10月12日，田紀雲主持召開對南朝鮮經濟貿易協調指導小組會議<sup>⑥</sup>。11月5日，中方通知來訪的朝鮮外長金永南：由於中國與南朝鮮貿易關係不斷發展，互設貿易辦事處今後恐怕在所難免<sup>⑦</sup>。1989年1月，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向大韓貿易振興公社正式提議，就雙方互相設立貿易代表處舉行談判<sup>⑧</sup>。中國領導人認為，「為保護各自的經濟利益」，採取這一步驟是「合適的，必要的」<sup>⑨</sup>。4月23日趙紫陽訪朝前，鄧小平讓他帶話給金日成：為了照顧朝鮮的立場，中國失去了與南朝鮮發展經濟關係的良好機會，已經落在蘇聯和東歐的後面，這種情況不能再繼續下去了；現在中國考慮發展與南朝鮮的經濟關係，但在政治上繼續支持朝鮮<sup>⑩</sup>。此後由於發生政治風波，設立貿易代表處的交涉一度中斷。11月6日金日成訪問中國時強調：希望中國不要在南朝鮮設立貿易代表處，不要讓朝鮮陷於孤立地位。江澤民表示，可以把這件事拖一拖<sup>⑪</sup>。但是，情況很快又發生了變化。

1990年3月江澤民訪問朝鮮時說：你們反對我們與南朝鮮互設貿易辦事處，心情可以理解，但此事是擋不住的了。4月25日，田紀雲秘密會見來訪的韓國鮮京株式會社社長李順石，這是中國國家領導人第一次會見韓國人士。田紀雲說：「中國政府非常認真對待、非常重視發展兩國關係」，「隨着雙方關係的發展，互設貿易代表處勢在必行」。還說，這個機構「實際上是半官方的」，可以授予「相當於領事的職能」<sup>⑫</sup>。9月12日金日成訪華時，江澤民再一次提出，中國與南朝鮮的貿易發展迅速，設立民間貿易代表處已經勢在必行。金日成被迫接受了這一現實，但條件是在美國承認朝鮮和朝鮮統一前，中國不得與南朝鮮建交<sup>⑬</sup>。於是，10月20日，中國國際商會便與大韓貿易振興公社簽署了互設代表處的協議<sup>⑭</sup>。貿易代辦處對外表面上是民間機構，對內實際上帶有官方性質<sup>⑮</sup>。這種機構的設置，為中韓雙方政治關係的發展打開了方便之門。

韓國對於同中國建交問題，一直採取積極進取的態度。儘管屢遭冷遇，甚至在1989年中國政治風波後在國內也遇到阻力，但盧泰愚堅持認為朝鮮半島的和平主要靠中國來保證，並把在其任內修好對華關係作為既定「國策」<sup>⑯</sup>。中國從1980年代初期開始重視改善對韓關係，但囿於朝鮮因素，對建立雙邊政治關係一直沒有鬆口，只是努力創造條件，等待時機。首先是1990年10月貿易代辦處的設立，邁出了中韓建交的第一步。隨後中國採取了積極態度，於1991年5月說服（或迫使）朝鮮接受南北雙方分別加入聯合國的主張，邁出了中韓建交的第二步。在中國領導人看來，是表明態度的時候了。1991年10月，鄧小平明確地告訴金日成本人，中朝「是兄弟，但不是同盟」<sup>⑰</sup>。江澤民也對來訪的日本公明黨委員長石田幸四郎說明：中朝已經不是同盟國了<sup>⑱</sup>。與此

同時，中國繼續推動朝韓和談及朝美會談，以營造中韓關係發展的國際氛圍。12月，第五次朝鮮北南方高級會談取得突破性進展，雙方在漢城簽訂了《關於北南和解、互不侵犯和合作交流協議書》；朝鮮聲明，將簽署核保障協議，並接受核查<sup>⑳</sup>。1992年1月，《勞動新聞》報導，朝鮮和美國將在紐約舉行高級會談<sup>㉑</sup>。韓國成為聯合國正式會員國，加上朝韓關係和朝美關係走向緩和，中韓建交的政治條件業已成熟<sup>㉒</sup>。於是，中國與韓國建交的「大戲」便緊鑼密鼓地開場了。

1992年1月23日，中國國際友好聯絡會（中國友聯會）常務副會長金黎安排韓國企業家張致赫與田紀雲會面。會面中，田紀雲說：「中國政府決定要和韓國建交」，「現在開始要進入政府間相互接觸的階段」<sup>㉓</sup>。2月，中國外交部便開始與韓國駐北京貿易處的代表正式接觸<sup>㉔</sup>。4月14日，聯合國亞洲及太平洋經濟社會委員會（ESCAP）會議在北京舉行。在此期間，中韓外長討論了雙方建交問題，並安排了建交談判事宜；隨後於5月13日和6月2日接連在北京進行了兩輪急速的建交談判，並達成一致意見。6月21至22日在漢城的第三輪談判，只是起草建交公報而已<sup>㉕</sup>。以往中國調整有關朝鮮半島的政策，都要事先徵求朝鮮意見，而在中韓建交問題上的做法則完全不同，是在中方已經做出決定後再向朝鮮通報的。在朝鮮的強烈要求下，1990年9月和1991年10月，中國領導人曾經兩次向金日成保證，不會與南朝鮮建交。然而，到1992年4月，楊尚昆還是利用祝賀金日成八十壽辰之機通知朝鮮，中國正在考慮與南朝鮮建立外交關係。對於金日成提出的延遲一年的要求，中方未置可否<sup>㉖</sup>。三個月後，一切準備就緒。錢其琛7月15日突然訪朝，當面向金日成通報了中國將與韓國建交的決定。金日成冷冷地說：朝鮮還要繼續堅持社會主義，有甚麼困難自己會克服<sup>㉗</sup>。

關於1989年政治風波後中國突然決定加快中韓建交進程的原因，尚無相關的檔案文獻可以參考。不過，從目前已經掌握的史料看，大致有以下幾點：第一，面對美國和西方世界的壓力，中國急需找到外交突破口，為改革開放提供有利的國際環境<sup>㉘</sup>；第二，韓國政府和企業界一直積極向中國靠攏，特別是沒有追隨西方參與制裁中國，自然成為中方一個重要的選擇對象<sup>㉙</sup>；第三，蘇聯和東歐各國自1980年代初迅速發展與韓國的關係，「交叉承認」已為大勢所趨，中國作為東北亞大國和朝鮮半島鄰國卻被甩在後面，甚為堪憂<sup>㉚</sup>。就中韓建交的過程而言，如果說前期積極主動的是韓國，那麼最後起決定性作用的還是中國。

1992年8月，中韓正式建立外交關係，雙方結束了長達近半個世紀的敵對關係。既然美國沒有侵犯中國的意圖，韓國也不是進攻中國的橋頭堡，那麼朝鮮也就不再成為中國的擋箭牌和戰略緩衝帶。對於中國而言，朝鮮半島的地緣政治結構和意義都發生了根本改變。

至此，中朝雙方的基本國家利益已經分離，構成兩國同盟基礎的各種因素也相繼消失，中朝同盟自然不復存在，而中韓建交就是「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實際上，中國只要堅持改革開放與和平發展的方針，勢必與朝鮮分手，中朝同盟遲早都會破裂，除非朝鮮也走上改革開放與和平發展的道路。

中朝同盟的瓦解標誌着中國把朝鮮作為遠東地區戰略緩衝帶的傳統安全戰略已經徹底失效，中國對朝鮮政策由「特殊」轉向「一般」的障礙已經徹底消除。從這個意義上講，在現代國家關係的基礎上重構中朝關係、全面調整中國對朝政策的條件，在客觀上已經完全成熟，中朝關係應該進入一個全新的歷史時期了。(本期續完)

### 註釋

① 韓國駐丹麥大使給外交部長的報告，1976年3月3日、26日，4月22日；韓國外務部與各駐外使館間的文電往來，1976年11月11至24日，韓國外交史料館，KR0500224-4，頁9-30；50-54。

② 《楊成武年譜》編寫組：《楊成武年譜(1914-2004年)》(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14)，頁501。

③ 施泰因霍菲爾(Steinhofer，原文未提供全名)致東德外交部報告，1977年11月17日，PAAA，MfAA(外交部政治檔案館—民主德國外交部檔案)，C6857；《李先念傳》編寫組、鄂豫邊區革命史編輯部編：《李先念年譜》，第五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頁469。

④ 《李先念年譜》，第五卷，頁461-62。

⑤ 〈去年以來朝蘇關係的一些情況〉，《世界共運》，第23期(1980年6月5日)，頁7-10。

⑥⑨⑫⑭⑯⑰⑱⑲ 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辦公廳編：《中聯部老部領導談黨的對外工作》(2004)，未刊，頁98；100-101；105；104-105；106；106-107；180-89；194-96、199；207。

⑦ 參見Chin-Wee Chung, "North Korea's Relations with China", in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North Korea: New Perspectives*, ed. Jae Kyu Park, Byung Chul Koh, and Tae-hwan Kwak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Seoul: Kyungnam University Press, 1987), 186-87。

⑧ Бажанова Н. Е., *Внешне-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связи КНДР, В поисках выхода из тупика*,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Издательская фирма "Восточ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93, с.146；《中聯部老部領導談黨的對外工作》，頁99。

⑩ 參見〈南朝鮮對外貿易的組織管理和特點〉，《外貿調研》，第239期(1979年2月22日)；〈南朝鮮專輯〉，《朝鮮問題資料》，總第7期(1979年4月)。

⑪ 《人民日報》，1981年3月12日，第4版。關於中韓之間零星的間接貿易，參見Jae Ho Chung, "South Korea-China Economic Relation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Its Implications", *Asian Survey* 28, no. 10 (1988): 1033。

⑫ Samuel S. Kim, *The Two Koreas and the Great Power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56。

⑬ Бажанова Н. Е., *Внешне-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связи КНДР*, с.146。

⑭ 參見《世界經濟導報》，1985年12月23日；1986年6月23日，8月25日，9月8、22日，10月20日；1987年12月7日；1988年1月18日，2月29日，4月11、17、18日，9月26日，10月31日，12月26日；1989年4月17日各期。

⑮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編：《中國改革開放大事記(1978-2008)》(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8)，頁175。

⑯ 《人民日報》，1988年7月4日，第1版。

⑰ 《世界經濟導報》，1988年7月25日，第3版；11月14日，第7版。

⑱ 《中聯部老部領導談黨的對外工作》，頁102-103；《人民日報》(海外版)，1992年1月29日。

⑲ 相關情況參見美國國務院情況簡報，1983年6月，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DNSA，數字化國家安全檔案)，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Two Koreas

(1969-2000), Item Number: KO00312; Jae Ho Chung, "South Korea-China Economic Relations", 1037-39。

⑲ Samuel S. Kim, *The Two Koreas and the Great Powers*, 56. 另有學者給出的相關數字為：1990年38.21億和4.827億，1992年82.18億和6.965億。參見 Andrew Scobell, *China and North Korea: From Comrades-in-Arms to Allies at Arm's Length* (Carlisle Barracks, PA: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U.S. Army War College, 2004), 140, 146。

⑳ Barry K. Gills, *Korea versus Korea: A Case of Contested Legitimacy* (London: Routledge, 1996), 229-30.

㉑ Кан Вон Сик,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северной Кореей: реальность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Ми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Номер 12, Декабрь 1999, с.35.

㉒ 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財務司、中國對外貿易統計學會編：《中國對外貿易經濟合作統計資料彙編(1950-1994)》(1996年11月)，收入《中共重要歷史文獻資料彙編》，第三十輯第四十分冊(洛杉磯：中文出版物服務中心，2010)，頁479-526、564-74、595。

㉓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頁199、217、468、476；美駐華聯絡辦致國務院電，1979年1月11日，North Korea International Documentation Project, *The Carter Chill: US-ROK-DPRK Trilateral Relations, 1976-1979: A Critical Oral History Conference*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2013), 435-36。

㉔ 鄧小平與福田赳夫談話記錄、鄧小平與大平正芳談話記錄，1979年2月7日，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開示文書》，16/04-592/1，頁1-8；16/04-592/3，頁1-14。

㉕ 鄧小平與福田赳夫談話記錄，1978年10月25日，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開示文書》，3/01-1980/2，頁1-12；中日首腦會談記錄，1983年11月24日，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開示文書》，18/04-1028/2，頁9-25。1983年10月9日仰光發生一起爆炸事件，韓國多名高級官員被炸死，但總統全斗煥倖免於難。緬甸政府因此宣布同朝鮮斷交。

㉖ 舒爾茨(George P. Shultz)致美國駐東亞及太平洋各外交機構電，1982年10月15日，DNS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Two Koreas (1969-2000)*, Item Number: KO00429。

㉗ You Ji, "China and North Korea: A Fragile Relationship of Strategic Convenienc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0, no. 28 (2001): 397. 作者的消息來源是對中國相關人員的採訪。

㉘ 詳見沈志華：《最後的「天朝」：毛澤東、金日成與中朝關係》(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7)，第六章第二節。韓國領導人對中國的公開言論感到困惑，不過美國人心裏十分清楚。參見中央情報局的情報備忘錄，1977年3月；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與韓國領導人談話記錄，1978年5月25日，《The Carter Chill: US-ROK-DPRK Trilateral Relations, 72; 348-49。

㉙ 《人民日報》，1978年10月26日，第5版。

㉚ 盛平主編：《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下卷(香港：泰德時代出版有限公司，2007)，頁874、1001。

㉛ 《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冊，頁1241；劉亞洲：《劉亞洲文集(二)》(北京，2004年6月)，收入《中共重要歷史文獻資料彙編》，第二十七輯(洛杉磯：中文出版物服務中心，2009)，頁311。

㉜ 布熱津斯基與黃華會談備忘錄，1978年5月21日，《The Carter Chill: US-ROK-DPRK Trilateral Relations, 338-39。

㉝ 《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冊，頁737、746-47、937；《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下卷，頁989、995。

㉞ 《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冊，頁1189-90。

- ③⑧ 李鵬：《和平、發展、合作——李鵬外事日記》（北京：新華出版社，2008），頁338、347；錢其琛：《外交十記》（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頁153、154。
- ③⑨ 《東亞日報》，1971年8月7日，第1版；《京鄉新聞》，1971年9月16日，第1版；《每日經濟新聞》，1971年9月16日，第1版。
- ④⑩ 韓國對中國的政策，1972年，韓國外交史料館，C-0051-03/4846/721.1，頁16、18、12-14。據韓國報紙1973年5月1日報導，韓國漁船在小黑山島近海救助了中國遇險漁民八人（《京鄉新聞》，1973年5月1日，第1版）。此後，中國漁民也多次救助過韓國漁民（韓中關係大事記，1975年5月28日，韓國外交史料館，C-0081-2，頁7-8）。
- ④⑪ 《東亞日報》，1973年3月17日，第1版。
- ④⑫ 《每日經濟新聞》，1973年6月25日，第2版。
- ④⑬ 布熱津斯基致卡特（James E. Carter）備忘錄，1977年8月27日，*The Carter Chill: US-ROK-DPRK Trilateral Relations*, 238。
- ④⑭ 韓國對中蘇民間學術文化領域的接觸嘗試，1975年1月17日，韓國外交史料館，C-0081-2，頁4-6。
- ④⑮ 韓國對中國的政策，1972年，頁9-17。
- ④⑯ 韓國與中國關係的改善，1976年，韓國外交史料館，C-06-0096-11，頁51-59。
- ④⑰ 《南朝鮮動態》，總第28期（1978年10月18日），頁2；總第30期（1978年11月15日），頁7；總第31期（1978年11月20日），頁1-2。
- ④⑱ 《東亞日報》，1978年11月1日，第1版。
- ④⑲ 《每日經濟新聞》，1978年11月18日，第1版。
- ④⑳ 《南朝鮮動態》，總第26期（1978年9月20日），頁2。
- ⑤⑰ 卡特與鄧小平會談備忘錄，1979年1月29日，*The Carter Chill: US-ROK-DPRK Trilateral Relations*, 447。
- ⑤⑳ 《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冊，頁468、508。
- ⑤㉑ 蒙代爾（Walter F. Mondale）與鄧小平會談備忘錄，1979年8月28日，*The Carter Chill: US-ROK-DPRK Trilateral Relations*, 663。
- ⑤㉒ 《人民日報》，1979年9月29日，第5版。
- ⑤㉓ 美國的情報就是這樣表述的。參見美國國務院簡報，1982年4月，DNS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Two Koreas (1969-2000)*, Item Number: KO00391。
- ⑤㉔ 張庭延：〈鄧小平關心朝鮮半島局勢——回憶鄧小平二三事〉，《黨史博覽》，2013年第5期，頁27-28。
- ⑤㉕ 《人民日報》，1983年9月8日，第3版；11月5日、11日，第3版；張庭延：〈鄧小平關心朝鮮半島局勢〉，頁27-28；延靜：《出使韓國》（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4），頁13。
- ⑤㉖ 日中外長會談記錄，1983年11月25日，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開示文書》，18/04-1028/3，頁1-15。
- ⑤㉗ 《人民日報》，1984年3月5日，第3版；4月7日，第3版。
- ⑤㉘ 韓國駐香港總領事致外務部長電，1986年5月9日，韓國外交史料館，9388/722.2，頁65。
- ⑤㉙ 《人民日報》，1986年8月17日，第1版；《勞動新聞》，1986年8月20日，第5版。
- ⑤㉚ 韓國外務部長致駐香港總領事電，1986年8月30日，韓國外交史料館，9388/722.2，頁82-83。
- ⑤㉛ 韓國外務部長致駐香港總領事電，1986年9月25日、韓國駐香港總領事致外務部長電，1986年10月17日，韓國外交史料館，9388/722.2，頁89-91；95-96。
- ⑤㉜ 譚宗級、葉心瑜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四卷（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640；金學俊著，張英譯：《朝鮮五十七年史》（2005），未刊，頁495；Шин В. А., *Китай и корейские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XX столетия*, Москва: Изд-во МГУ, 1998, с.73-74。有關這一事件處理的檔案，目前韓國和中國均為開放。

- ⑥⑤ 《李先念年譜》，第六卷，頁201。
- ⑥⑥ 《東亞日報》，1983年9月1日，第2版。
- ⑥⑦ 張庭延：〈鄧小平關心朝鮮半島局勢〉，頁27-28；劉亞洲：《劉亞洲文集（二）》，頁317。
- ⑥⑧ 韓國外交史料館，38190/743.73，頁75-80、125、137；21579/724.32，頁240；9388/722.2，頁14-15、43-44、62-69、147。
- ⑥⑨ 田紀雲：〈懷念小平同志〉，《炎黃春秋》，2004年第8期，頁3。
- ⑦⑩ 〈當前南朝鮮外交動向〉，《新情況》，第63期（1988年5月9日）；劉亞洲：《劉亞洲文集（二）》，頁310-11；延靜：〈歷史的抉擇〉，《報告文學》，2008年第1期，頁72。
- ⑦⑪ 延靜：《出使韓國》，頁13-14。
- ⑦⑫⑬⑭⑮ 劉亞洲：《劉亞洲文集（二）》，頁281；282-84；313-14、318-26；302-303。
- ⑦⑯ 詳見張庭延：〈鄧小平關心朝鮮半島局勢〉，頁27-28；劉亞洲：《劉亞洲文集（二）》，頁287-88；金學俊：《朝鮮五十七年史》，頁527-28、543。
- ⑦⑰ Andrew Scobell, *China and North Korea*, 166.
- ⑦⑱ 延靜：〈歷史的抉擇〉，頁70。
- ⑦⑲ Jae Ho Chung, *Between Ally and Partner: Korea-China Relations and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 44.
- ⑦⑳ 中央領導同志談國際形勢和對外關係，《外事動態》，第7期（1989年4月11日）。
- ⑧① 《人民日報》，1990年10月22日，第4版。
- ⑧② 劉亞洲：《劉亞洲文集（二）》，頁313-14。1990年11月30日，作為韓方派往北京負責貿易處行政事務談判的代表，就是韓國外交部東北亞二科的書記官（副處級）丁相基。筆者採訪丁相基記錄，首爾大學，2017年8月12日。
- ⑧③ 《朝日新聞》，1991年10月8日。轉引自平岩俊司：《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唇齒關係」的結構與轉型》（橫濱：世織書房，2010），頁199。
- ⑧④ 《人民日報》，1991年12月14日，第6版；12月24日，第6版。
- ⑧⑤ 參見《人民日報》，1992年1月19日，第6版。
- ⑧⑥ 1991年底《人民日報》關於朝鮮半島走向緩和的一篇綜述，看起來就像是為改善中韓關係大造輿論。參見《人民日報》，1991年12月30日，第6版。
- ⑧⑦ 張致赫：〈盧泰愚總統的親筆信令鄧小平感動〉，《朝鮮月刊》，2014年9月號，頁163。中國友聯會與張致赫長期接觸，在中韓秘密建交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筆者採訪聶曉華（時任中國友聯會亞洲部副部長）記錄，北京，2016年3至4月。
- ⑧⑧ 筆者採訪丁相基記錄，首爾大學，2017年8月12日。
- ⑧⑨ 錢其琛：《外交十記》，頁155-56；延靜：〈歷史的抉擇〉，頁73-74。
- ⑧⑩ 《中聯部老部領導談黨的對外工作》，頁194-211；延靜：〈歷史的抉擇〉，頁74。
- ⑧⑪ 錢其琛：《外交十記》，頁158-59；延靜：〈歷史的抉擇〉，頁75。
- ⑧⑫ 中國友聯會為此做了大量工作。筆者採訪聶曉華記錄，北京，2016年3至4月。
- ⑧⑬ 1989年7月，張致赫通過金黎向中國轉交了韓國總統盧泰愚的一封親筆信。信中說：韓國對中國在天安門事件中採取的特殊措施表示充分理解，並將向韓國的友好國家轉達這樣的意思。據金黎說，鄧小平看到這封信後表示感激。參見張致赫：〈盧泰愚總統的親筆信令鄧小平感動〉，頁160-61。
- ⑧⑭ 詳見〈蘇聯東歐國家與南朝鮮關係新動向〉，《新情況》，第176期（1989年12月9日）；〈朝鮮半島局勢現狀及走向〉，《國際內參》，1992年1月26日，頁9-12。